本版编辑：李少军
E-mail：t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049

反腐：文学与历史的双重解读

——中央党校培训部举办第十二期“大有读书茶座”

□ 刘彦彩　付如初

6月2日晚，主题为“反腐：文学与历史的双重述说”的第十二期“大有读书茶座”在中央党校育园楼举行。本期读书茶座邀请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周大新和著名历史学者、畅销书作家、百家讲坛主讲人张宏杰，分别选取获得2015年度中国好书的《曲终人在》和《中国历史的教训：张宏杰讲明清反腐》，从文学和历史的角度探讨了腐败问题的根源、本质以及官员如何坚守道德底线等问题，给在场的一百多名学员带来了一场难得的精神盛宴。中央党校校委委员、培训部主任罗宗毅出席并讲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全局的高度，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部署，开启了党的建设新篇章。反腐不仅极大地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生态，改善着党风政风，更深入地影响着党员干部的执政思维和工作方法。两位专家和主持人以三人对谈的方式，从文学情怀和历史反思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精彩的解读，给现场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大新



张宏杰

从文化、历史、哲学的角度反思腐败问题

周大新从创作《曲终人在》这部小说的初衷谈起，他从自己接触普通百姓、商界人士和各级官员的感受入手，深深忧虑腐败问题给社会风气带来的负面影响。党的十八大以后，反腐出现了新局面，他在为之欣喜的同时，用现实主义的笔法，塑造了一个省长欧阳万彤的形象，并借这个形象，表达对官员的期许：一个官员之所以能够在社会管理的岗位上，是带着党和人民的期待和信任，倘若他思虑的问题只是个人和家庭的得失，而不是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不是百姓的利益，那他不是一个合格的官员。

张宏杰从历史、哲学、文化、人性的角度思考了腐败与反腐败。他认为，反腐败是中国所有王朝的治理重点，但是几乎没有一个王朝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深思。这既有制度的缺陷，也有文化的惯性，从微观看，还有人性的矛盾。因此，只有从政治、制度、文化、人性多个角度进行结合的观察，才能获得比较全面的认识。张宏杰同时用朱元璋反腐失败的教训，讲述了制度建设的必要性。他指出，朱元璋反腐手段之烈，举世罕见，但是最后却常常哀叹“为什么腐败越反越多”？究其根本原因，是讲人治不讲法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推进从严治党，这应该是反腐败斗争的一项重要工作，减少腐败发生几率也最明显。两位主讲人指出，反腐是一项综合性工程，要从传播新文化、完善制度建设等多个方面合力推进。

领导干部如何坚守底线

对于这个问题，周大新有着独特的感受。他认为书中人物欧阳万彤能够从一个普通乡镇干部成长为省部级官员，就是因为坚守了“不伸手”的底线。周大新认为，做官有“三条线”，高线、中线和底线。所谓高线，是以为国家为民族奉献为政治抱负；中线，是尽职尽责，恪尽职守，为政一方，造福一方；底线则是不是自己的东西不拿。而坚守底线，需要时时刻刻对自己手中的权力有清醒的认识：一是权力的“权”，有“权且”的意思。党员领导干部只是代行人民赋予的权力，你自己并不是权力的本身，如果你不能正当地行使权力，甚至滥用权力，则权力随时会被收回。二是官员在贪污和廉洁的选择中，实际上暗含着一个“升沉法则”：腐败必然是万丈深渊；而如果保持廉洁，在官场洁身自好，则不会面临坠入深渊的危险。三是制度和法律，本质是用来约束人性本身的自利和贪婪的，官员守住了党纪国法，就是守住了个人的底线。张宏杰则用海瑞、曾国藩等人的例子，用宋明理学和明清理学的差别，讲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忠君思想和士大夫的个人修为作为双重约束，为为官清廉建立道德防线的例子。比如曾国藩年轻时曾写下一句训诫：绝不靠升官发财，此后秉承一生。

营造良好家风防腐败

在三人问答的主要环节结束之后，两位作家还与在场的学员进行了互动。其中，有学员问到，目前的贪腐现象中，家庭成员的腐败占有一定的比例，那么一个官员，是不是应该成为一个背离家庭的人呢？如果不是，官员如何避免家庭成为腐败的动因之一？

对此，两位作家都进行了精彩的解读。周大新在《曲终人在》这部书里，就重点关注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家庭尤其是子女的利益，会成为官员最容易被攻破的环节，那么进行良好的家风教育，时时警惕这样的环节，是最为关键的。张宏杰则以《曾国藩家书》中的教训为例，以曾家几代人才辈出的典范为例，进一步阐述家风建设，不仅对为官有益、对子女成才也有益的道理。曾国藩主张不给子孙留遗产，要求贵族子弟衣食起居“与寒士同”，对孩子要求非常严格。两位主讲人都强调，作为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重视家庭教育，营造良好家风，这既关系官员本身能否做到清廉不贪，而且也关系到能否为子女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家庭氛围。

活动最后，中央党校校委委员、培训部主任罗宗毅做了精彩点评。他指出，这是一场含金量很高的对话，两位作家以人性为基点、深深的家国情怀，既能够深深地打动现场的每一个人，又为大家深入理解腐败与反腐败的问题提供了新鲜视角。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知不足。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加强自身修养、提高党性意识，担当起党和人民寄予的深切厚望，不辱使命。

大有读书茶座

为政者“生命的境界”

□ 沈小勇

张载“横渠四句教”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一种何等境界追求！

中国传统从政修养学说强调对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的双重追求，主张“修身”与“为政”的融合，“学问”与“事功”的融合，“成己”与“成物”的融合，在本质上体现了“入世的情怀”和“生命的境界”的双重融合。儒家强调“三不朽”的追求，即“立德、立功、立言”，乃是一种人生的大文章。

冯友兰曾提出著名的“人生四境界说”，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给出了一个不断升华的四境界：自然境界最低，往上是功利境界，再往上是道德境界，最后是天地境界。儒家的真精神强调的正是“入世的学问”和“生命的学问”，是一组由自我、社群、自然、天道构成的不断拓展的同心圆。儒家哲学的智慧体现的是成己成物之学，是修己安人之学，是明体达用之学。天地境界也是中国人的文化信仰所在，在天地之间要写一个大写的“人”。王阳明从小追求“理想境界”，他不满足于私塾先生“科举求功名”的回答，直指本心，“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追求圣贤境界才是王阳明的人生理想所在。所以，他后来特别强调“圣学只是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一生追求“致良知”的生命境界。诚如文天祥所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他追求的乃是“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的生命境界。

中国传统从政修养学说主张对于生命境界的追求，追求的乃是一种仁义天下的精神，一种民胞物与、以百姓心为心的情怀。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答：“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儒家强调的精神乃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追求的是一种不断拓展的大生命境界。历史上，范仲淹的“忧乐情怀”，郑板桥的“以竹喻情”等都是生动的实践写照。范仲淹乃是一代名臣，名垂青史，他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后世为官之道影响深远。郑板桥一生为官敬民爱民，他的诗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流传至今。程颢在《定性书》中提到君子为政的生命境界：“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可以看出，儒家主张“为政以德”的境界追求乃是一种“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理想境界。人生的成功不仅在于“事业上的成功”，更应当突出“人格上的成功”。我们今天汲取传统从政修养的目的，既不是为了要求功名富贵，也不是寻求所谓简单的感官快乐，而是在根本上要寻求一种身心的和谐，获得一种“文化的生命力”。

周敦颐在《爱莲说》中独独标举“莲花”，他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芋蔬可卒岁，绢布是衣食，饱暖大富贵，康宁无价金，吾乐盖易足，廉名朝暮箴。”儒家追求的这种生命境界特别注重内心精神的追求，主张以“仁德之心”，超越日常生活的困境，在不断的为政实践中，不畏艰难，乐以忘忧，安贫乐道，勇于进取，从而实现自我的生命境界追求。中国传统从政修养学说强调，要以这样的生命境界追求去影响后人，教育子孙。“人遗子孙以财，我遗子孙以清白。”（南朝徐勉）曾国藩在家训中多次谈到：“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尔等）为大官，但愿（尔等）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绝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惟天下至诚，能胜天下至伪，惟天下至拙，能胜天下之巧。”

中国传统从政修养是一种为政的修养，更是一种生命的智慧，为何很多人最后走向了“身败名裂”？可见“保初节易，保晚节难”是一种更大的智慧。

书而思

共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 胡秀荣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委员联组会议时，将新形势下的政商关系界定为“亲”“清”二字，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提出了总的指导方针。政商关系目前存在两个极端不正常现象，一个是“勾肩搭背”（权钱交易、利益输送），另一个是“背靠背”（不吃、不拿也不干），勾肩搭背就不“清”，背靠背就不“亲”。不“清”和不“亲”都不是正常的政商关系形态，都严重危害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6年第6期“本刊策划”栏目围绕如何治理政商关系的不“清”和不“亲”，共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展开，邀请学者、政府官员及民营企业家从不同角度撰写了一组文章，以期能在实践层面提供一些参考。

本组文章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武汉大学中国民主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储建国教授在文章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有机体，政商关系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局面，政商关系不仅有很强的包容性，而且尚未定型，建立新型政商关系实际上是要在新的理论指导下将这种关系定型化。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唐亚林教授认为，中国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的大发展目标，需重塑政商关系的互动机制与交往规则，将地区层面的“微制度创新”与全国层面的“整体性制度创新”有机结合，及时总结各地的有益做法和成功经验，对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作出系统化、整体化、制度化、法治化的战略部署，并予以切实实施。唐教授特别分析了广东省佛山市纪委监察局2016年4月份推出的《佛山市政商关系行为守则》和《佛山市政商交往若干具体问题行为指引（试行）》，他认为，佛山市结合经济发展实际列出了具有可操作性、可衔接性的政商关系“负面清单”，是地区层面的“微制度创新”。对于政商关系中存在的不“亲”现象，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刘俊生教授提出了四维度政绩考核法，促使“亲”“清”型政商关系的建立。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四局局长宋寒松提出，要充分发挥打击、预防、监督、服务、保护等多元功能，促进形成新型政商关系。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副主任孙晓莉分析了政商关系中红顶中介的危害并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具体措施。《普京如何治理俄罗斯政坛的官商勾结现象》《发达国家的政商关系》两篇文章提供了国际经验的借鉴。我们还特别邀请了中央党校部分学员和民营企业家分别作为政商关系“政”和“商”一方，谈了各自对政商关系的认识和体会。新型政商关系需要共同构建，共同维护，唯此才能推动中国不断走向发展繁荣。

报刊聚焦

（上接1版）

记者：请问您认为高等教育要履行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重大使命，应当重点把握什么问题？

杜玉波：任何时候高等教育都要把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核心使命。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高质量人才和高水平科研的支撑，是当前高等教育最重要的历史使命和战略任务。履行好这个使命，要做的工作很多，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要解决好结构调整问题。当前毕业生就业难的根源在于结构性矛盾。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用人需求下降，总量压力很大。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最为需要的应用型、复合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十分紧缺，人才的供给和市场需求“对不上”。造成这种情况，重要原因在于一些学校定位不科学，学科专业特色不明显，人才培养的类型、层次不清晰，缺乏与行业和区域发展需求紧密结合的机制。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快结构调整，找准发展定位和服务面向。

要坚持学科有选择性发展，有所为有所不为。学科专业不在多、不在全，而在特、在强，在处理学科专业的存量和增量问题上，都要坚持这样的思想。对现有学科专业格局，学校一定要有宏观把握和科学设计，既不能一成不变，也不能因人而设随意变，关键要集中建设好与本校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相匹配的学科专业群，压缩“平原”，多建“高峰”。事实上，世界一流大学中没有一所能够覆盖所有学科专业，而我们的不少高校却在热衷追求所谓“综合性”“全科式”发展。高校学科专业上的盲目布点、重复设置、“多而散”的功利行为，现在看来问题很大，必须痛下决心建立学科专业设置的预警机制，把就业状况反馈到人才培养环节来，科学合理设置学科专业。

当前，还有一个倾向也要避免，就是层次类型不能盲目攀高、一味追求学术型，而要形成梯度、对接需求。今后研究生教育要以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为重点，坚持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协调发展。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更多地要以提高创新能力为目标，而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更多地要以提升职业能力为导向。本科教育的定位是要培养适量的基础性、学术型人才，但更重要的是要对接国家战略和区域需求，加大力度培养多规格、多样化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记者：现在不少高校都很关注“转型”问题。您认为高校为什么要推动转型，怎么推动转型？

杜玉波：高校为什么要推动转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高等教育所依存的这个经济社会的大环境在转型。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必然要求高校的办学思路和人才培养模式作出相应调整。“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在推动转型的问题上，我们的态度要坚定，不能动摇，也不应当有疑虑和观望。

推动谁来转型？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所有高校都面临一个转型的问题。但具体到高等教育内部来看，地方本科高校尤其是2000年后新建的这批本科学校转型发展的紧迫性相对要更强一些。因为从面上来看，这些学校存在的学科专业趋同、人才培养模式滞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不足、就业结构性矛盾等问题比较突出。

转型转什么？不是“挂牌”，不是更名，不是学校升格，绝不是说换个名或者升一格就叫转型了。转型的核心是结构调整和内涵转变，明确办学定位，把办学思路真正转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转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来，转到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上来，转到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上来。具体来说，就是紧紧围绕创新驱动发展、“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突破口，推动学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专业课程设置、实践教学资源、教师队伍建设等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上转。

怎么推动转型？关键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政府和学校的关系。在关注和支持地方高校以联盟等形式推进转型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明确政府主导转型发展的方式。国家层面关键是做好顶层设计、政策支持和典型引导。顶层设计方面，《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明确了转型的思路方向和关键举措。政策支持方面，通过招生计划、师资培养、合作办学、财政倾斜等措施，重点扶持奖励那些在体制机制上有突破的高校，推动省级政府开展地方高校转型发展试点。这里，我还要特别说两句话：一句话是转型的主要责任在地方。各地经济结构和产业发展需求有很大差异，省级政府应当对本省、本地区高等教育结构和高校的布局规划做出设计，调动省内资源支持本省高校的转型。另一句话是转型的主体是学校。每个学校转型的规划和方案，都应当由学校自己确定，这样既利于充分调动学校在转型上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也是高校办学自主权的体现。

记者：最后，请您介绍一下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应当重点解决好哪些问题？

杜玉波：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提升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去年，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总体方案》，国务院以专门文件印发下达。《总体方案》指出，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要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这就明确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总的指导原则和建设方向。“十三五”规划也指出，“提高高校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使若干高校和一批学科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我理解，学科水平是一所大学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学科特色是一所大学最根本的特色。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首要的是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当前落实好《总体方案》和“十三五”规划，要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解决中国高等教育服务和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这是国家的大局，是第一位的问题。二是解决中国所有高校都要争创一流、办出特色的内在动力问题，这是让所有高校都能感到有希望、有奔头，办学积极性都能得到充分发挥的需要。三是解决一流学科建设的目标和路径问题，这是把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的迫切需要。我们必须站在这样一个高度，对统筹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进行总体设计。具体来说，一是突出学科导向。以学科为基础，面向学科建设水平高、具备较好建设条件的高校，统筹学校整体建设和重点建设，通过一流学科重点突破，带动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使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二是改革遴选支持方法。充分依托第三方评价，参考借鉴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学科评价要素，综合高校高水平学科建设成效、办学质量、重要贡献和国际影响力等情况，采取认定方式确定建设一流学科的高校，重点支持一批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学科，重点布局一批国家急需、支撑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发展的学科。三是打破身份限制。设立高水平准入门槛，建立公平竞争的遴选机制、有进有出的激励约束机制，始终保持一流学科建设的活力和竞争力，在公平竞争中体现扶优扶新、扶需扶特，努力形成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学科体系，引导不同类型的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四是强化质量管理。进一步增强高校财务自主权和统筹安排经费能力，完善经费管理方式，提高经费使用效益。实时动态监测，制定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办法，开展中期建设的绩效评价、周期结束后的总体评价，强化过程管理，建立退出机制。总之，没有固定身份，没有一劳永逸，一流建设永远在路上。